



管世铭八股文批评述论

陈水云 江 丹

摘 要: 管世铭是乾隆时期八股文写作和批评大家。其论八股文,重经史考据,以考据为八股,同时讲究才法兼备,追求意不求工而文自工的化境;其文其人,文行合一,重视气节风骨,主张学以致用;管氏时文与古文并重,推尊八股文体,认为“代圣贤立言”重在领会圣贤之意。他的八股文批评观,既有史料价值,更具当世价值,其论为文之道,亦是论为人之道。

关键词: 八股文; 科举; 管世铭

管世铭(1738—1798),字臧若,一字韞山,江苏武进(今属常州)人。生在书香世家,少通经史,精习六经,然数蹶秋闱,乾隆三十九年(1774)始中举人。又四年(1778)中进士,授户部主事,为大学士阿桂倚重,后官至监察御史,仕途较顺,可谓“遭时太平,致身通显,宜无有不释然者”^①。管世铭是乾隆时期著名的诗文名家和制义大家,有《读雪山房唐诗钞》《读雪山房杂著》《韞山堂诗文集》《韞山堂骈文》《制艺三集》《宋人绝句选》等。从八股文的角度看,他是乾隆时期考据八股派的代表,“既有考据学家的博学,又有词章家的才情技巧”^②,后之学子多摹其声调,“故一时转移间,群趋于《管稿》”^③。在中进士之前,管世铭已研习八股文 20 余年,通籍后仍以写作八股文为志业。其子管学洛记其父,“一生雅好制义文字,通籍后犹时时为之,多读书,得间及抒写怀抱之作”^④。时人亦谓管世铭以制艺雄一代,“其《韞山堂稿》百年以来几于家弦户诵,士束发受书无不知有管蕴山者”^⑤。晚清诗人张维屏老而退居江村,不谈时文,惟以韞山之文时时诵之。“尝谓时文至管韞山,盖合义理、法度、书卷、声情融而为一矣。”^⑥这是管世铭所达到的为文之最高境界,也表明管世铭的时文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八股文,而成为当世制义之典范,他的八股文批评观也代表了其时文场创作与衡士之祈向所在。

一、以考据为八股,又能才法兼备

江国霖在《制艺丛话序》中论及:“自有制义以来,固未有不根柢经史,通达古今而卓然成家者。”^⑦为制义而能自成一家,首要的基础是根柢经史,贯通古今。“明于义理,挹经史古文之精华”^⑧,这是对制义作者的学养要求。据载,管世铭教子读书强调:“每日不阅古

① 庄忻:《韞山堂文集序》,载管世铭《韞山堂文集》卷首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393 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,第 464 页。

② 孔庆茂:《八股文史》,凤凰出版社 2008 年,第 364 页。

③ 叶德辉:《郎园读书志》卷十五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,第 710 页。

④ 震钧:《天咫偶闻》卷七,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,第 167 页。

⑤ 李梦符:《春冰室野乘》卷上,世界书局 1923 年,第 35 页。

⑥ 张维屏:《国朝诗人征略二编》卷三十九,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年,第 987 页。

⑦ 梁章钜:《制艺丛话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,第 6 页。

⑧ 《方苞集》卷二,刘季高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,第 579 页。

书数寸,不得妄诮下帙。读书多则义理日出,境界日开。沉潜既久,但一含毫落墨,清言名理,自然辐辏,因题立格,自然成章。”^①读经通史,沉潜涵泳其间,日久才可明义理,境界亦渐开,这样落笔成文,自然有格调,有章法。

管世铭曾作有《经学》一策,对十三经的版本流变做了梳理,并表明其宗经立场。“圣人之作经也,犹天之悬日月,地之奠河岳也。日月明而阴阳叙,河岳奠而高深列,六经作而伦纪昭。王者之治,舍是无以为治也。儒者之学,离是无以为学也。”其论经学实为论经义张本,把制义之源头追溯到宋熙宁中以经义取士。“唐以帖经试士,专取记诵,无关义理。熙宁中,始更经义,则今制义之缘起焉。国家功令乡会试五经专主程(伊川)、朱(晦翁)、胡(文定)、蔡(九峰)及陈(澹)氏之传说,以归画一。又有御纂《四经》、钦定《三礼》并列学官。先列程传朱子本义《易》、朱子集传《诗》、蔡传《书》及先儒精粹《春秋》、《三礼》之说为正义,次则采诸家之可并存者及别义之可旁通者,后以按语折衷之,使学者沿流讨源,由同证异,一洗专己守残之陋,而益窥圣人作经之心。此田(何)、伏(生)、毛(萇)、戴(圣)所以全羽翼之功,而服(虔)郑孔贾可以免聚讼之失矣。”^②他指出,国家以经义取士意在使学者沿流讨源,习八股以经义为本而兼采诸家,以此可“由同证异,一洗专己守残之陋”,而准确地领悟圣人之旨意,也反映出管世铭的考据家立场。

管世铭论文重考据是当时学风祈尚的真实反映。早在康熙时雷以山辑《乡党文菴》八股文合编,以考据《论语·乡党》为主,初开八股考据之风,这一风气在乾嘉时蔚为大观。“时艺之遵朱注,功令也,而《乡党》文则不然。《乡党》一篇,大而朝庙宫廷,细而饮食衣服,无一事不资考据,而朱注阙如也。”宋儒专言义理,清儒则不然,能文之士多从考据入手,务求发圣学之根本。所谓“考据不确,则题解不明,虽名手无从下笔”。风气如此,“衡文者未尝以功令绳之,势不得不然也。”^③考据派八股不必遵朱注,而是以考据为基础,讲求言必有据。管氏当年应乡试之题“享礼有容色”,释“礼”与旧解不同,以“享”与“礼”对举。按《礼仪》经文,“‘宾裼,奉束帛加璧享’,‘及享,发气焉盈容’,皆未尝加‘礼’字,而享之后,私觐之前,尚有礼宾一节仪,视享、裼加详。经文‘若君不见,使大夫受’,不礼不拜,至‘礼’字,皆专指礼宾而言。至‘小聘曰问,不享;主人不几筵,不礼’,则直以两事对举。以《论语》之享礼分属二节,正合经义,故韞山破题即云:‘兼享与礼宾,以观圣人之色。’”^④再以《见贤不能举》一题为例,题出《大学·传》第十章,“见贤而不能举,举而不能先,命也。”题中“命”字,朱熹《集注》:“命,郑氏云:‘当作慢。’程子云:‘当作怠。’未详孰是。”管氏对此持异议,“读命为慢,究不免屈经从传,玩上节语意,明是以恶恶成其好善,此节似不当平对。以前段作开,以后段作合,则命字不烦改读,而白文往复循环之妙,亦倍有味外味也。”^⑤从这两段材料,可见管氏学问之精深渊博,对经义有疑义处,则以考据之法释之,以考据为八股乃其八股文之特色所在。

但考据派八股重注疏引证,于义理用心不够,于词章更不措意,文章学问气浓,而文学性不足,故流传不广。考据名家能以八股知名者,如阮元、任启运、江永、杭世骏、管世铭等皆是考据、文章俱佳。管世铭能以八股名世,盖因不薄训诂,亦重义理、词章,不类一般考据八股之枯索。因此,对于文法的重视和才气的强调,成为管世铭八股文批评的另一重要倾向。

管世铭有一段话专门谈到,当时文坛从事八股文作者有“抗心希古”与“专工帖括”两种情况,这反映了其时文坛“尚才”与“重法”的两种趋向。

制艺起于近代,抗心希古者,平时多不屑为,而特降意于场屋,至时而强为之,辄山野不能入格;其专工帖括者,轨步绳趋,既尽得其曲折,而未尝沉浸古籍以恢张而变化之,率皆老生常谈,卑无高论,令人厌而思去。是以,才高者轶于法,法密者囿于才,二者交讥,实则楚失,而齐亦未为得也。若既擅夫才,又习其法,足以矜能于一世矣,而文佳境地可到^⑥。

①震钧:《天咫偶闻》卷七,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,第167页。

②管世铭:《韞山堂文集》卷七,载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,第508页。

③路德:《乡党文菴序》,载《怪华馆全集》卷二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4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,第270页。

④梁章钜:《制艺丛话》卷十三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,第275页。

⑤梁章钜:《制艺丛话》卷十三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,第291页。

⑥管世铭:《韞山堂文集》卷三,载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,第482页。

他认为“抗心希古”与“专工帖括”皆有其弊，前者慕古文之道，平时对八股文不屑为之，但为场屋之计又要勉力为之，因为没有经过八股文的严格训练，所以缺少八股之法度，此之谓有才无法；后者以专工帖括为务，“轨步绳趋”，深谙于八股之法，但是缺乏才气，也不曾浸淫古籍，没有研经读史后产生的心得体会，所谈义理都是老生常谈，不免令人生厌，这叫做“有法无才”。这里的“才”，有才学之意，“法”指行文之法，如何解决“才高者轶于法，法密者囿于才”的矛盾呢？他提出“既擅夫才，又习其法”，这样才能臻于八股文之上佳境界。他还特地谈到赵榕冈的制义，认为其为文“循循焉，抑抑焉，若不蘄胜于人，而元气灌输，脉络融畅，才不欲尽而韵自流，意不求奇而理自至”。在他看来，境界上乘的八股文应该是不为展才而才韵自显，不为意奇而文理自至，也即不求工而自工之境界。

二、文行合一，学以致用

管氏论文尤重气骨，这与其为人行事重气节相一致，所谓“言为心声，真经济、气节人，即制义可以覘其概”^①。管氏所为八股识力精当，取径高古，行文气势充沛，自成一家。其《其次致曲》一文，后二大比，笔墨醇古，文气充沛，论理雄肆，快人耳目，尤见功力风骨^②。刘权之评曰：“理窟中能为名士风流，必此间巨手也。”^③又如《学而时习之全章》后二比：“功修当不息之期，就令独行无徒，不以移其永矢，而闻声相思之雅，早共此油然之心，理与厥修以俱来，迨酝酿既深，而二三同志之余，苟不足与于斯道者，反若瞠乎其无见，非人之识有未逮，乃吾知所历日以不同也，夫亦欣然足以自慰矣。理道至厌心之会，则虽誉满天下，诂以怠其修能，而赏奇析义之欢，转幸此寂处之蓬庐，得交资而进业，设声华早耀，则与人家国之后，求所为卒于此者，或恐卹乎其不遑，及此人不見知之时，而吾与朋之所造俱未有以限量也，曷不俛焉日以孳哉？”其友周景益以文见心，评曰：“前比言不愠，即是说乐；对比言不愠，即是时习。作者七荐不售，意豁如也，而其文弥昌，观此二比，其所养可知矣，安得仅以文人目之。”^④从管氏文章可见其气度风骨，“七荐不售”而无挂怀，豁达如此，言为心生，文以明道，不能仅仅以文人视之。

钱维乔说：“韞山乃仅以文章传于世乎？余交韞山三十余年，知之稔矣……慷慨尚气节，能面折人过，不少婢阿，其于天下事可知矣！”^⑤众所周知，武进管氏素有重名节操守之家族精神，临大变而不改节。明清易代之际，管氏族入管绍甯及三子、从弟管绍恂及家仆崔三强皆慷慨就义，捐躯赴国难。及至管世铭，处承平之世，其气节更多地表现在为人为官，刚烈耿直，清正廉洁。敢于面折人过，“指陈时政，弹劾权要”^⑥，能一无所惧。他以才干品行称名，并受知于权臣阿桂，桂依之如左右手。“时富察文襄王、章佳文成公皆引重府君，每遇大事，必曰：‘质之管君’。”^⑦管氏亦怀治世之宏愿，在一众百官依附和坤之时，勇于弹劾，其与和坤相斗的事迹为士林击节称赞。《清史稿·列传》、管绳莱《先大父侍御府君行状》、陆继辂《崇百药斋文集》、李梦符《春冰室野乘》、葛虚存《清代名人轶事》、商衍鎤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》均载其事。“时和坤用事，世铭忧愤，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，语讥切无所避。”^⑧对权倾朝野的和坤，管世铭不仅不依附，而且时时欲弹劾之，“时时持正论折其牙角”^⑨。据载，“武进管侍御世铭，在台垣负亢直声。一日，与友人酒坐，时和坤以伯爵官大学士，众誉伯揆无虚日。侍御披酒大言曰：‘诸君奚为者，吾方有封事。’众皆骇愕。是夕侍御归邸舍，遽卒。”^⑩正因管世铭为人为官清正廉明，处事公允，“为人磊磊落落，克敦内行，遇事忼爽，交友劝善规过，无所渎恣，而与谋必尽其诚，气宜良笃”^⑪，故为士林所重。所以

① 梁章钜：《制艺丛话》卷十三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，第 88 页。

② 清代八股文的格式基本为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题、起二比、中二比、后二比、束二比，起中后束要求两股对偶成文，合起来共八股，故谓之八股文，后二比一般点名题旨，最显笔力深厚与否。

③ 梁章钜：《制艺丛话》卷十一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，第 212 页。

④ 梁章钜：《制艺丛话》卷十一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，第 213 页。

⑤ 钱维乔：《韞山堂文集序》，载《韞山堂文集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393 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，第 464 页。

⑥ 钱维乔：《韞山堂文集序》，载《韞山堂文集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393 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，第 464 页。

⑦ 管绳莱：《先大父侍御府君行状》，载《韞山堂诗集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393 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，第 363 页。

⑧ 赵尔巽等：《清史稿列传》卷 143，载《清代传记丛刊》第 92 册，明文书局 1985 年，第 233 页。

⑨ 李梦符：《春冰室野乘》卷上，世界书局 1923 年，第 35 页。

⑩ 葛虚存：《清代名人轶事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，第 43 页。

⑪ 钱维乔：《韞山堂诗集序》，载《韞山堂诗集》卷首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393 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，第 361 页。

如此,不仅仅在于其文章高义,更在于其为人之高洁,其志向之高远,正如管氏本人所推许的,“文章之外尚有平生志事在也”^①。从文行合一的角度看,其文可证其行迹,其行迹正是其文所论儒家道义之践行。

八股文根于经术,本于儒家道德,旨在用世,士子习八股的目的在于“日以义理浸灌其心,庶几学识可以渐开,而心术群归于正也”^②。“夫取士以四书,四书皆圣贤之言,所以垂教万世,学问经济备焉,而谓詮发而阐明之,无益于身心可乎?”^③真正以之为立身之本者,涵泳其间,领会精神,能够培养出读书人的胸襟气度和真儒风范。管世铭正是一位有气骨的真儒,具有古来贤者的淑世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慷慨之气。管氏的制义正是其人品的写照,文如其人,极具骨力。在他看来,“有明帖括之兴,虽与前代之文不同,然代圣贤立言,果能以程朱之理,运韩欧之气,亦足以刻划天地之情,囊括古今之变态,而士之器识与学养,胥于是觐也……盖士之所谓学者,大之在格致存正,修齐治平,下及于方名象数之微;士之所谓文者,博之于经籍史传诸子百家,而约之以中正和平之旨……学者诚能敦本尚实,以消其浮竞之心,强识力行,以作其委靡之气,何患其学不为修己治人之学,其人不为经术有用之文乎?”^④敦于学行,笃于实践,其人其行,其经术其文章,皆相耦合也。

从管世铭为人为文皆重气骨,人文一致,可见出管世铭对八股文之态度,亦即视八股文为载道之文,习八股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世。庄炘在《韞山堂文集序》中慨叹,“士大夫殚精毕智于决科之文,业成名立,乃始以其余力治古文辞,故常不逮古人,而又以丽多用寡之曼词、党枯鹜朽之朴学,误用其心志,反不若经义之高明,犹足与圣言相发明矣。”^⑤受重义理的常州学派的影响,庄炘、管世铭皆倡导经世致用之学。庄炘明确反对“丽多用寡之曼词”与“党枯鹜朽之朴学”,相比于词章、考据,庄炘重时文义理,以发明经义,有益于世。管世铭也深受常州学风之浸染,以古文辞为根基,作文讲究通经致用,于事理皆备。“自其少时所为,矻矻穷年者自六经诸子以及百家之言,皆尝讲明而切究之,则古文辞之根柢已具。及登仕版,当世之务,问之详而思之审,发为文词,必有当于事理而凿然其可行。”^⑥正因管世铭于读书作文中究治事之理,怀治世之才,有治世之能,故为大学士阿桂所倚重。“以是重臣之即讯节,使之奏报,皆欲得韞山以自佐。此在韞山为余事,然独非有裨实用之一端乎!韞山尝言自宋南渡以后有所谓性命之学、事功之学,然遁于虚者易、责以实者难。当为其易者乎?抑当为其难乎?此则韞山不欲为空言无补。”^⑦

治学在穷理明得失治事之道,管世铭在其文中引其从叔管叔厓之言论说读书作文之道。“松厓叔氏论时文对策有云,作文之道,先积理,斯阴阳向背、圣狂敬肆、是非可否之原,无不悉矣;多读书,斯天地万物、礼乐兵农、治乱得失之原,无不悉矣。”^⑧钱维乔的序也论及管世铭的为文宗旨,“韞山之参机务,平漱腴,出入风义,亦未尝不措诸用矣。其生平志略,既一一见之于诗文,又一一见之于文。其文不名一家,而说经则淹博而中理,序事则疏通而有物,皆不苟为无益之言,而足资后人之考镜者。”^⑨从钱维乔序中可见管世铭为文宗旨,不为无益之言,说经而中理,言而有物,有益于世,以为后人用世之镜鉴。

三、关于时文与古文的多角度思考

在论才与法、文与行等关系之后,管世铭还对八股文其它问题,也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。这里把它们归纳为三个方面:

(一) 时文与古文关系

光绪十九年刊本《管韞山文稿》,有月华山人(刘云搏,即刘鹗,又名刘铁云)之叙称:“管先生其人者,

①管世铭:《论文杂言四十一则》,载《韞山堂文集》卷八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,第520页。

②方苞:《进四书文表》,载《方苞集·集外文》卷二,刘季高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,第579页。

③钱维乔:《管韞山续刻制义序》,载《竹山文钞》卷一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6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,第205页。

④管世铭:《文体科目士习》,载《韞山堂文集》卷七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,第510页。

⑤庄炘:《韞山堂文集序》,载《韞山堂文集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,第463页。

⑥庄炘:《韞山堂文集序》,载《韞山堂文集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,第463页。

⑦庄炘:《韞山堂文集序》,载《韞山堂文集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,第463页。

⑧管世铭:《论文杂言四十一则》,载《韞山堂文集》卷八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,第521页。

⑨钱维乔:《韞山堂文集序》,载《韞山堂文集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,第464页。

以古文之精神，奏时文之音节，堂堂乎盛世元音哉！”^①谈到管世铭较好地处理了时文与古文的关系，力图将古文与时文融会打通。友人庄炘忆，“余交韞山在乾隆己卯之岁，其时余颇学为古文辞，而韞山锐意举业，有声胶序。”^②管世铭当年虽用心于举业时文，然亦不废古文辞，及嘉庆三年（1798）九月他与庄炘再晤京师，示所为古文辞两巨册，“非好而乐之，曷为多且工如是”^③？管世铭虽为考据派名家，其时文仍承桐城之统绪，做到义理、法度兼备，叶德辉评曰：“管世铭之文出于方苞。”^④

管世铭古文时文兼重的态度，与管氏对八股文体的推尊有关。在为好友韦静山所作制义序中，他评韦静山文“精覈渊雅，有张晓楼、任钧台之风”。但静山“失意后颇怏怏，将弃帖括以就选人”，管氏惜制义之学日微，希望同道之人静山能不弃此道，故“书此以叙其集端，将以广其意阻其行，而劝终其业也”^⑤。由此可见管世铭推尊八股文体的立场。“尝记与周宿航论时文，虽小道，然果精其术，亦自足以刻画天地之情状，囊括古今之变态。”^⑥时文能有此境界，实与古文同，而管氏尤重时文，与他通经致用的立场相关，时文亦是载道之文，治学应通经致用，有补于世，不为空言。正如章学诚所言，“向之方、王、储诸家制业，间有举及之者，辄鄙弃之为不足道。夫万物之情，各有其至，苟有得于意之所谓诚然，而不为世俗毁誉所入，则学问文章，无今无古，皆立言者所不废也。”^⑦

在管氏看来，制义虽起于近代，但其体非卑，制义之至境绝非章句小儒可到，需惨淡经营，会悟超旷，“刻画天地之情状，囊括古今之变态”。梁章钜《制义丛话》中所载管氏的一段话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，“时文之境地，常若有域焉以限之，未易言深造也。惟苦心强力之至者，岁引月伸，晨摩夕荡，迟之又久，而此域始豁然以开，则举身之所遭值，目之所俯仰，耳之所听受，莫非吾文之所取资，而字里行间，仍各视其所养之浅深以为厚薄，非可以一蹴而几也。”^⑧管氏论作八股之道，也即论为文之道，作八股文能游刃有余，由技进乎道，为文章焉能不臻化境？亦反映出管氏推尊八股文体的态度。

（二）对“代圣贤立言”之新论

管世铭为《韦静山制义》所作序，还称其文“贯穿三礼而出之以心得”^⑨。在他看来，制义在遵经的基础上讲究出之以心得。制举讲圣贤之道，本是本于本心所认同，其逻辑预设是为文者认同此道，故以文载道，本于四书五经，以表达自己的认识与心得，也即章学诚所言：“举业虽代圣贤立言，亦自抒其中之所见。诚能从于学问，而以明道为指归，则本深而末愈茂，形大而声自宏。”^⑩要求根柢经史，学问深厚，本于主体认知，体现为文者之心之精神。正如江国霖所云：“士人读圣贤书既久，各欲言其心之所得……心之所造有浅深，故言之所指有远近；心之所蓄有多寡，故言之所含有广狭，皆各如其所读之书之分而止。吾故曰制义虽代圣贤立言，实各言其心之所得者也。”^⑪制义能反映士子读书的多寡与修养及境界的高低，真正的八股名家是能自树立有所得。“虽所得有浅深，而其文具存，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见。”^⑫潜心于八股文者，以八股文表达其对圣贤之道的领会和认知，文如其人其心，可见其行身职志。

管世铭认为，“前人以传注解经，终是离而二之。惟制义代言，直与圣贤为一，不得不逼入深细。且章句集传，本以讲学，其时今文之体未兴，大注极有至理名言，而不可以入语气，最宜分别观之。设朱子之前已有时文，其精审更当不止于是也。”^⑬就体制而言，八股文比以前的墨义帖括更能考察一个人的才情学识，以传注解经，重在疏通经义，而代言要求体会圣人之心，以圣人的口气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圣贤意；传注解经，注疏、正义与经文为二，而制义代言是将传注与经文合而为一，故制义之精审胜过以传注

①月华山人：《管韞山文稿序》，载《管韞山文稿》卷首，光绪十九年刊本。

②庄炘：《韞山堂文集序》，载《韞山堂文集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，第463页。

③庄炘：《韞山堂文集序》，载《韞山堂文集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，第463页。

④叶德辉：《郎园读书志》卷十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，第710页。

⑤管世铭：《韦静山制义序》，载《韞山堂文集》卷三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，第483页。

⑥管世铭：《论文杂言四十一则》，载《韞山堂文集》卷八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，第521页。

⑦章学诚：《叶鹤涂文集序》，载《章学诚遗书》卷二十一，文物出版社1985年，第207页。

⑧梁章钜：《制艺丛话》卷一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，第19页。

⑨管世铭：《韞山堂文集》卷三，载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，第483页。

⑩《章学诚遗书》卷九，文物出版社1985年，第84页。

⑪江国霖：《制义丛话序》，载梁章钜：《制艺丛话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，第5页。

⑫《方苞集·集外文》卷二，刘季高校点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，第579页。

⑬董思骥：《韞山堂稿序》，载管世铭：《韞山堂稿》卷三，湖南书局，光绪庚辰九月重刊本。

解经。正如钱钟书论《左传》之记言云:“遥体人情,悬想事势,设身局中,潜心腔内,忖之度之,以揣以摩。”^①钱钟书先生追溯代言体至《左传》记言,谓明清八股文揣摩孔孟情事栩栩如生。

制义代言相比章句集传的佳处,在于制义代言可入口气,是以我之心与圣贤之心为一,而能体会深细。沉潜于儒家圣贤学说,以圣贤之心去体悟领会,长此以往,圣贤之心即我心,“朝夕从事渐渍于其中而不觉”^②。所谓“四书五经之言皆圣贤心学所在,我之心即千古圣贤之心,我于圣贤之言一一体会于心,想其光景,玩其趣味,务得之所以然之故。久之,而义理通融,充然有自得之学”^③。这样做出的文章口气即是圣贤之口气,心理时空与圣贤为一,能想见圣贤眉目神情,而文章也尽得圣贤精髓。这样一个长期训练的过程,使我以圣贤之心去体悟去理解透彻圣贤之意,而所得不离圣贤原意,又为我心之所得,也即代圣贤立言,言我心所得,所得与圣贤相契。代圣贤立言也即将自己的心得体会以圣贤口吻惟妙惟肖地道出。正如明末制义名家陈际泰《太乙山房稿自序》中自评其文,“泰文凡数变,然其意皆以一己之精神,透圣贤之义旨为宗。”^④八股文是在领会圣贤之意的基础上代圣贤立言,而表达的是己见。己见不是空疏发言无端之见,而是磊落光明以明道为旨归的己见。要做到与圣贤之意相契,必得通读古今圣贤书,出入经史,言而有物,也即前文所论的八股文作者的基本学养。

(三) 关于清朝诸家制义

管氏还著有《论文杂言四十一则》,其中泛论清代制义名家:“尝取国朝之文论之,以制义而直接八家之统者,方百川是也;以制义而尽撷注疏语录之精者,李安溪是也。熊次侯龙行虎步,振开国之元声;韩慕庐吸露餐霞,息尘寰之杂响。故论品,方、李为高;论功,熊、韩为大。经制题不可杜撰一语,当以六经为脚注,储中子、张晓楼是也;理境题不可抄袭一语,必以白战奏奇功,方百川、方望溪是也。王墙东文着着紧,储在陆文步步宽,皆人所最不能及者。名稿之最利举业者,其方望溪、储中子乎?方善用虚,储善用实,兼斯二者犹掇蛭矣。”^⑤这里谈到八股文的作法,比如经制题与理境题、着着紧与步步宽、用虚与用实等,然其重要意义在于对清初诸名家制义特色的比较、总结和历史定位。

管世铭所评李光地、韩荃、熊伯龙与刘克猷被推为“清初四大家”。熊伯龙有《熊钟陵稿》传世。所谓“龙行虎步”,是说他的制义风格古茂雄直,气魄宏大,有刚健之气,确乃“振开国之元声”。李光地有《榕村全集》传世。作为理学家,李光地学问渊博,制义说理细微,发明经义,故管氏评其文“以制义而尽撷注疏语录之精”。李光地尤其反对明末清议之风,认为明末时文看似气势凌厉,实则无味,义理不足,故主张在义理上下功夫。李光地学问经纬史,他的制义亦可作理学观,每篇制义皆发明一种义理,文后自记其对经书义理的理解阐释^⑥。韩荃有《有怀堂诗文集》28卷传世。韩荃的八股文在当时影响很大。康熙十二年韩荃中试,其文稿皆呈御览。《制义丛话》卷九引乾隆十七年(1752)二月上谕:“礼部尚书韩荃种学绩闻,湛深经术,其所撰制义清真雅正,实开风气之先,足为艺林楷则。”故管世铭评其文曰,“韩慕庐吸露餐霞,息尘寰之杂响。”韩荃是清初八股文的集大成者,义理、词章皆备,文章清真雅正,是清代八股文的典范和代表。其“清真雅正”的文风开清代八股文的盛世之音,成为清代衡文取士的重要标准,影响所及,不仅时文,桐城派古文亦如是。

继韩荃之后,江左有三大文派——桐城二方、宜兴储氏和金沙王氏。桐城二方是指方舟、方苞兄弟。方舟早逝,然其制义为韩荃赏识,成一代大家,有《方百川稿》传世。方苞,晚号望溪,有《望溪先生文集》《抗希堂稿》等传世。方氏兄弟皆出韩荃门下,百川善学唐宋八大家之文,以古文笔法写宋人义理,善于写情,寄情遥深。故管世铭评说,“国朝之文,论之以制义而直接八家之统者,方百川是也。”方苞虽声名远胜其兄,然制义成就不及方舟。二方出入于唐顺之、归有光之唐宋派,善学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、唐宋文,触类旁通,敷陈论策,明白如话。方舟、方苞文皆从古文笔法,故长于议论说理,见从己出,故管世铭评说,

① 钱钟书:《管锥编》,中华书局1979年,第166页。

② 《刘大槐集》卷三,刘季高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第97页。

③ 李枏:《困学纂言》,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子部第1188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,第506页。

④ 梁章钜:《制义丛话》卷七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,第120页。

⑤ 管世铭:《韞山堂文集》卷八,载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,第521页。

⑥ 孔庆茂:《八股文史》,凤凰出版社2008年,第284~286页。

“理境题不可抄袭一语，必以白战奏奇功，方百川、方望溪是也。”而“论品，方、李为高”，可见管世铭对文章义理的重视。李光地、方舟皆长于发明义理，阐释经义。

宜兴储氏以时文称名者为储欣和储在文。储欣，字同人，又字在陆，有《在陆草堂集》传世。相对古文来说，时文非储欣所专，但长期揣摩训练，时文亦工，“时文非所屑为，屈首一为之，皆约六经之旨以成文。”^①储欣博通经史，幼习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，时文兼经义与古文之长，既能载孔孟程朱之“道”，又注意吸纳秦汉唐宋古文之“法”，亦是以古文为时文之能手。储欣读书得其精，能融汇贯通，文境开阔，故管世铭谓之“储在陆文步步宽”。以储欣为首的宜兴储氏家族形成了康熙时期著名的文章流派——宜兴派，在清初文坛影响甚大，储在文是其代表。在文，字礼执，又称中子，储欣从孙，有《经畬堂自订全稿》传世。储中子作时文，亦是以古文为根基，深于经术，储欣为其时文作序时说，“礼执之学，深探六经，采汉宋注，参钞卷端，附以己见，熟复史汉，吟绎韩欧苏氏之书，他若诸子百家，无不览也，无不掇也。窥其心，将博极而止，而所得往往发之于时文。”^②储在文为文谨守法度，议论正大精严，被人称为时文正宗，便于后学者仿效。管世铭评说，“名稿之最利举业者，其方望溪、储中子乎？方善用虚，储善用实，兼斯二者犹掇蛭矣。”盖方苞文精语层出，不用钩连，而储在文文必征实，不做空论，故有“方善用虚，储善用实”之说。储在文学问淹博，精于义理，深探六经，故其制义皆以六经为脚注，依注而敷理，管世铭评其文，“经制题不可杜撰一语，当以六经为脚注，储中子、张晓楼是也。”张晓楼，名张江，江西南城人，与王汝骧从侄王步青为挚友，亦是当时制义名家，其为人规矩森严，义理皆从六经出。“晓楼文凡三变，而其大旨要以疏濬性灵、羽翼经传……读书日富、观理益深，抉经之心、提传之要，闳深肃阔。”^③

相比于储在陆文步步宽的是王墙东的“着着紧”。王墙东名汝骧，字云衢，金坛人，有《墙东集》《明文治》等传世。王汝骧及其从侄王步青是金坛文派的代表。王氏家族与储氏家族为世交，文章互有切磋，王汝骧曾得储氏指授，“为二先生（指储大文、储在文兄弟）所弟畜”^④。翁方纲评其文，“其法密而气醇，宜有以发其微妙之诣……耘渠时艺不特在金坛王氏推为师长，即在国朝诸名家虽气度或逊前哲，而精诣过之。后有作者，未之能或先也。”^⑤

管氏所论诸家，皆是清初以来制义名家，并以古文入时文为其长，这与明清八股文坛形成的“以古文为时文”的传统有关。自唐顺之、归有光等兼擅古文与时文之唐宋派名家倡导以古文为时文以来，时文古文多相融合。桐城派方苞以古文而兼擅时文，主张以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之义法，“触类旁通，用为制举之文”^⑥。倡导义与法，主张时文义理与章法兼备，也是管世铭力主以古文之精神运时文之音节的具体体现。

管世铭在清代以制义享誉一时，重根柢，有才情，守法度，但在八股文批评史上也有其贡献，一是他的制义是当时考据八股的代表，二是他的制义体现了他的性情和风骨，三是他对明清八股文坛关注的重要话题，如时文与古文的关系，关于“代圣贤立言”的理解以及对清代名家创作特色的认识，都有其独到见解。虽说有些论题并不是他的首创，但却是当时世风与文风的真实反映，值得关注。

●作者地址：陈水云，武汉大学文学院；湖北 武汉 430072。Email: danielchen0629@whu.edu.cn。

江 丹，武汉大学文学院。

●基金项目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(10BZW067)

●责任编辑：何坤翁

①储欣：《在陆草堂文集》，载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59册，齐鲁书社1996年，第372页。

②储欣：《在陆草堂文集》，载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59册，齐鲁书社1996年，第484页。

③王步青：《已山先生文集》卷二，载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228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，第428页。

④王步青：《已山先生文集》卷二，载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228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，第431页。

⑤翁方纲：《复初斋文集》卷十七，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455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，第519页。

⑥《方苞集·集外文》卷四，刘季高校点先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，第613页。